



写满隶体墨书的木觚。

本版图片由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提供

余姚花园新村地块出土简牍类文书

“文献名邦”再添实证



鹿角骨器。

于越故地、文献名邦又添实证。昨日，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发布余姚市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考古成果，出土封检、木觚、木板等简牍类文书若干，是本次考古的重大发现。

2020年7月至11月，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单位，对余姚梨洲街道花园新村1-6号地块内前期勘探发现的汉六朝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遗址地处明清时期余姚县城南城的巽水门外，地势低洼。发掘表明，该地块原始地貌北高南低，北侧为受潮汐活动影响而形成的灰黄沉积土高地，南侧为宽广的水域。本次发掘平均深度约1.3米，地层堆积可

分五层。

遗址主体堆积为一处汉代濒水遗存，也有少量的六朝遗存。共发现河道、临河护岸、木构设施、灰坑等遗迹十余处，出土陶、瓷、石、铜、木、骨器等各类器物300余件，还采集了一定数量的动植物遗存。

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黑陶、灰陶器为主，主要器型有罐、盆、钵等生活类器皿以及纺轮、网坠等生产用具。釉陶器、印纹硬陶器也有少量出土。青瓷器集中出土于扰土层，可辨器型有两晋、南朝时期的越窑青瓷盏、湘阴窑碗，还有鸟头瓷塑。铜器有五铢、剪轮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铜钱及铜削、铜环等。木器有益、梳篦及各类加工后的建筑材料。此外还出土

大量的砖块、板瓦、筒瓦及少量的云纹瓦当等建筑构件，骨器也有零星出土。

简牍类文书是本次考古发掘的一项重要收获，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封检、木觚、正反面墨书的木板各一件。封检底部有封泥匣、穿孔和沟槽，检面墨书经红外扫描后或可释读为“王仲邮棨”。

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全长46厘米，由一根木材纵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刷朱漆，五行皆有隶体墨书。木觚虽然有所残损，但仍可辨识出150余字，初步释读可知，其内容为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天帝使者”为余姚县官口（此字未能识别）乡临江里男子孙少伯祈福禳病而

告社君的文书。

考古人员表示，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考古发掘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全面认识本地区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具有鲜明的濒水特征，木构设施中木、竹类材质的构筑工艺皆可溯源自本地区史前遗址。遗址出土的木觚文书，是余姚作为“文献名邦”的实证，更是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同时，遗址濒临明清时期的余姚南城，与东汉晚期以来的余姚县城隔江相望，可以说是余姚南北双城的雏形，对研究余姚古代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许超 何华军

余姚出土的汉简上写了什么？



写有“王仲邮棨”的封检。

汉简这个名字，听上去离宁波有些遥远。

我们熟悉的汉简，如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都远在距离宁波几千公里外的大西北，大漠黄沙，相对干燥易保存的气候，才是它们的“标配”。

宁波及周边，出土过汉简吗？“没有，这是第一次发现。”余姚市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许超告诉记者，宁波发掘过汉墓葬、汉窑址、汉城址，但此前从未发现简牍文字。

而本次发现的木觚，有可辨文字150余字。经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内容为一篇祭祷文。

汉代，这里是个水乡

余姚市花园新村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门的西侧原有花园桥，因位于明代光禄寺卿陈焕府邸的花园附近而得名。

陈焕，明正德年间进士，以“父子四进士，兄弟三科甲”成一方美谈。陈家父子先后入仕，迁居余姚南城后，在巽水门外择地建造府第花园。清光绪《余姚县志》对这个精美的园林多有记载。

不过这次考古发现的年代，比陈焕造花园早了1000多年。

“从出土遗迹看，这里水系发达，应该曾经是个水乡。”许超告诉记者，该遗址陆续发现了河道、护岸、木桩、栈道、码头，全部指向濒水环境，可以断定遗址所处位置是临水的河岸。

现场出土的木觚上有一句“余姚县官口乡临江里”，指示了该地的地名。“从当时行政区划来说，县下面有乡，乡以下有里”，该遗址所处“临江里”，应该就是一个基层聚落。

“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的考古发掘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全面认识本地区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许超说。



出土的草鞋。

出土物中有一个“信封”

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出土遗物共计300余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简牍类文书。许超告诉记者，本次发掘，出土有封检、木觚、正反面墨书的木板各一件。因长期处于饱水环境，木器不朽，状况良好。

其中，封检残长22厘米、宽5.6厘米、厚0.8厘米，底部有封泥匣、穿孔和沟槽，检面墨书经红外扫描后或可释读为“王仲邮棨”。

许超表示，汉代，为了使传递的公私文书保密，往往使用一枚木简盖在上面，并在緘绳的交叉处押封泥，若有人擅自开启，便有痕迹可查。这枚发挥封緘作用的木简被称为“检”。检的面上通常题写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寄送方法，相当于今天的信封。

受书写材料、埋藏环境的影响，简牍上的墨书常会淡化，通过红外设备进行摄影或扫描，可以发现在可见光下观察不到的细节。

红外扫描后的封检可见“王仲邮棨”四字，可认作是写给一个叫“王仲”的人的一封信。“邮”便是邮递，“棨”或为“启”，即让王仲开启的意思。

不过本次出土，只有信封，不见内容，不知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木觚上的“祭祷”

比起信封，同时出土的木觚文书更加重磅。这件木觚上可辨文字有150余字、刷朱漆、内容体现当时的信仰，这三点，每个信息量都很大。

汉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有竹、木两类。圆木被削成柱状的多面体，被称为觚，是简牍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木觚有三棱、四棱、六棱甚至八棱。各面写了还能再削，削了可以再写，“就像古人的练字工具、草稿纸。”

哪怕在北方，木觚的出土量也不是很大，其中最著名的是1977年嘉峪关出土的“汉武帝遗诏木觚”。宁波能发现这么一件非常不容易。

许超介绍，该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全长46厘米，由一根木材纵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五行皆有隶体墨书。特别的是，该件木觚表面刷有朱漆。“漆在当时很宝贵，刷完漆也就意味着它已经‘定稿’，不会再被削了。”许超据此推测，这件木觚应有特殊用途。

木觚上的文字，经初步释读可知，其内容为东汉永平十七年“天帝使者”为余姚县官口乡临江里男子孙少伯祈福禳病而告社君的文书。“意思是，当地有个叫孙少伯的人生病，向社君祈祷，希望病早点好。”社君可能是当地的神祇，反映民间信仰。木觚上这篇“祭祷”的每个字都是较标准的汉隶，没有涂改，可见写的人很慎重。

“天帝”是东汉时期的至上神，“天帝使者”则是天帝信仰的衍生物，常见于东汉时期的镇墓文、买地券中。许超说，这种信仰多见于中原，而宁波也出土了反映该信仰的遗物，“对于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有重要意义。”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何华军